

天生

反叛

[美] 弗兰克·J. 萨洛韦 著
曹精华 何宇光 等译
顾 肃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BEL

反叛

五卷



[美] 弗兰克·J. 萨洛韦 著
FRANK J. SULLOWAY
曹精华 何宇光 等译
顾 肃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Copyright © 1996 by Frank J. Sullowa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天生反叛
著 者 弗兰克·J. 萨洛韦
译 者 曹精华 何宇光
责任编辑 吕 佳
审 校 顾 肃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页 2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70—2/G·70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个性往往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待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也往往很不相同,这是为什么?社会上有些人倾向于维持现状,有些人则支持变革,这又是为什么?《天生反叛》一书即试图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方面,以全新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本书作者弗兰克·J. 萨洛韦是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人脑与认知科学系研究学者。他专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达25年之久,对西方科学史(尤其是包括达尔文主义革命在内的几十次突破性科学革新与革命)和社会变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资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对史实和有关假说用科学方法反复加以验证,目的是调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对待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与很多学者的看法不同的是,萨洛韦得出结论:一个人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科学和社会变革,其决定因素存在于家庭内部(即个人成长的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以及从而形成的个性),而不在于各个家庭之间(即社会经济地位)。

本书在美国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上与学术界很大反响,

FS76/6

1996年列入前100部最畅销书排行榜。很多著名学者对本书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具有“开创性洞察力”,有可能“使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性质发生革命性突破”,“其长远影响可与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的理论相比”,说它“为观察人类历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现将本书译出,以供中国读者参考。

原书除正文外还有大量的注释和附录,主要是提供方法学和背景方面的说明。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需求和篇幅的限制,这部分基本从略未译,只保留了一项附录。

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曹精华、何宇光、刘加英和朱宪春,最后由曹精华、何宇光统稿,并约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顾肃审校。王碧莹老师为译稿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一并致谢。

引 言

本书是在一个让人困惑不解的谜的启发下写成的。为什么有的人具有超凡的才智和胆识,能够摒弃他们所处时代的公认见解,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些大胆而有远见的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就是其中的三位。无论革新思想多么激进,无论反对意见多么强烈,有的人很快便认识到这种革新的不同凡响,并站出来坚决捍卫它。

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后,在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时至今日仍未平息。尽管他的思想遭到强烈反对,有的科学家却很快认识到达尔文是继艾萨克·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科学革命者。另一些人则对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可能性深感不安,污蔑达尔文为误入歧途的无神论者,说他背弃了正确的科学推理方法。少数派的观点最终还是战胜了多数派,达尔文则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离艾萨克·牛顿不远。

作为一名革命的思想家,达尔文的成功向人们提出了另外一个关键性问题:为什么在剧烈变革中,有的人能迅速抛弃他们陈旧而错误的思维方式,而其他入却死守现有的教条?我这里所提的问题,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作出过不

同的解答。为什么有的人大胆反叛,而其他入却热心维护现状?针对这个问题,尽管有许多假说和大量的实验研究,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言,人们是否接受这一学说显然与宗教信仰有关。但是,也有不少科学革命之所以引起强烈争议,原因是技术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例如,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就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抵制,最终才被地质学家们所认可。

年龄有时也被作为相关因素提出来,但受年龄影响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父母有时拥护新的思想,而他们自己的子女有时却反对同一种革新。伟大的博物学家艾蒂安·杰弗罗伊·圣伊莱尔在达尔文发表自然选择理论的25年前就信奉进化论了,但艾蒂安的儿子、同为博物学家的伊西多,却反对这些不合乎传统的观念。在政治领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长子威廉,竟反对美国独立战争,并作为一名亲英分子被驱逐出境。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年龄竟然与革命倾向不相关。

有关激进思想的另外一个时髦假说涉及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冲突。人们常说,革命的思想家都曾与父亲或母亲闹过别扭。采用具体举例的方法,并不难找到支持该论点的证据。但采用同一方法,也同样容易找到相反的证据。不错,与大多数科学家相比,达尔文年轻时所经历的与父亲之间的冲突多少要大一些。但与他共创自然选择理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却和双亲都有着极好的关系。还有一些著名科学家虽然也都使自己学科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却没有经历明显的俄狄浦斯冲突,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路易·巴斯德和马克斯·普朗克。就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父母的关系也比大多数科学家要好。

时常有人用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解释对革命的态度差异。但革命性的争论却无法用社会阶层来阐释：大革命往往使家庭成员分化，一起长大的同胞也不例外。正如法国大革命的见证人之一在法国恐怖统治时期所评论的那样：“这场不幸的革命最为糟糕之处就是它在个人圈子里，如家庭内部、朋友当中，甚至是情侣之间所散播的不和。这种不和无所不染。”与此判断相一致的是，史学家也从未发现法国国民公会（1792～1794年）的成员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有什么重要的差异。然而这些多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之间的剧烈争斗，却导致了恐怖统治时期的严酷政策，同样也使这些政客将自己的五十多名同事送上了断头台。在这一点上，如果还要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要看看被选入国民公会的16个弟兄也就够了。这些弟兄在更多情况下分别隶属于对立的政治派别。新教改革运动对家庭成员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使得夫妻反目、父母与子女抗衡、同胞自相残杀。

上述这些及其他试图阐释激进思想的说法，都没有注意到有关人类行为的一个简单而令人吃惊的现象：人的个性中的大部分个体差异，包括构成反叛倾向的基础的那些差异，都产生于家庭内部。要问为什么有的人会反叛这个问题，包括为什么少数极富远见的个人会发动激进革命，等于问为什么同胞兄弟姐妹会如此相异这个问题。

《天生反叛》由四篇组成，逐步深入地阐释全书的基本论点。第一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有的科学家能欣然接受激进思想，而其他的人却不能？查尔斯·达尔文改信进化论的经历揭示了有关革命思想的一个常见特征：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在内，是抵制激进革新的。生物学证据促使达尔文接受了进化论，但面对同样的证据，他最亲密的同事们却拒绝放弃自己所信奉的神造说。将达尔文转变成激进的革命者所需要的远不止证据本

身。为他铺平道路的生平环境体现了本书作者通过研究西方历史上六千多人的生平事迹所得出的一些见解。有的人似乎生来就是要反叛的。

我的主要论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发现：一起长大的同胞几乎像出生于不同人家的人那样有着不同的个性。这一发现已被个性心理学研究完全证实，它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经历对于每个孩子怎么会如此不同？同胞差异是由家庭内部的偶然影响和经历造成的呢，还是说其中的一些影响与分隔家庭环境的一些变量系统相关联？性别无疑是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但它是惟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出生顺序又如何呢？这对同胞中的每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同的。翻阅一下有关出生顺序的文献，可以发现该项变量的相关性很强，但由于这些研究结果时常相互矛盾，出生顺序就被忽略了。实际上，这些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方法问题。除了方法问题外，大量有关出生顺序的文献都缺乏恰当的理论视点，因而不能正确解释所得出的结果。如果对有关出生顺序的文献重新加以适当的阐释，就可以发现一些显著的趋势，并朝着同胞为何如此相异这个问题的解决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新兴的进化心理学学科，为理解家庭生活，包括同胞为何如此相异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同胞差异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起因是对家庭资源的竞争。有关这些资源的纠纷，尤其是有关父母的爱护的纠纷，导致竞争的产生。在自然界，任何反复出现的冲突往往会引起冲突者适应性的变化，以增大竞争中占上风的可能性。同胞为获取竞争中的优势，便利用各自身高与体力上的长处。这些差异决定了同胞相互竞争中所采用的许多战术。衡量这些身体差异，以及决定在家庭内部的地位的关键因素是出生顺序。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头生

子女所完善的策略促使后出生子女采用了相对抗的策略。结果是在家庭内部展开了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军备竞赛。同胞冲突占据各种冲突的首位,关于这一点,就连《圣经》也与进化论相吻合。《圣经》中的第一起谋杀——该隐杀害其弟艾贝尔——就是对兄弟的谋杀。

头生子女更易为权力和权威所认同,这是自然的。他们最先出现在家庭里,往往凭借身高与体力上的优势维护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与自己的弟妹们相比,头生子女更武断,与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丧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于采取防御的姿态。而后出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体系中处于劣势,往往对现状提出质疑,有时还会逐渐形成“革命性的个性”。后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所处时代认为是确立已久、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异议。历史上无畏的探险家、破除传统观念的人,还有持异端邪说者大都出自他们当中。

不难看出,出生顺序的影响,同性别的影响一样,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明确而显著的后果。就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出生顺序时常决定了谁生谁死,谁有政权谁没有,谁能成功地找到配偶和繁殖后代。本世纪之前,父母对头生子女的投资通常较大,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够成功地传宗接代。历史上,头生子女往往生养更多的孩子。即使在长子继承制出现之前,家庭规模就常常受资源不足的限制,致使杀婴以及没有父母照顾等事件在后出生子女中发生得最为频繁。为了长大成人并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后出生子女长期以来一直与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处于冲突的状态。

行为进化与各种举止是如何分别学会的,这是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孩子并不继承做头生子女或者后出生子女的特殊基因,所继承的只是对父母的投资能成功地进行竞争的基因。家

庭环境决定了这些竞争倾向的表达方式。就个性而言,每个头生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后出生者,反之亦然。出生顺序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为家庭环境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本书的第二篇探讨的是除出生顺序以外的其他各种影响个性的因素。同胞产生差异的原因与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相同的:差异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例如,假如孩子们能够避免直接竞争,双亲中谁有精力就去求谁,那他们就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养育和关心。同胞相异的情况就是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位置如何分隔的写照,也是父母投资以及其中任何可觉察得到的偏爱的写照。尽管父母尽最大可能要对子女公平一致,但偶尔也显出对某些孩子的偏爱。对任何社会不公的感受也不如对在自己家里所遭受的不公的感受要更为深切。这种感受如果得不到平息,便会逐渐削弱对权威的尊重,从而为革命性的个性打下基础。

诸如性别、气质、父母与子女的冲突、父母的丧失等特定因素使我们能更好地预测革命性的个性。旨在最大限度地扩大父母投资的同胞策略,就是由这些及其他一些变量一起决定的。甚至连独生子女也与同胞方式类似。这似乎是件怪事,但来自未出生同胞的威胁可对此作出解释。未出生同胞对家庭生活所产生的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影响,就和他们赖以存在的卵子与精子一样是真实的。

同胞策略通常带有突现特征。出生顺序、性别和气质都参与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个性特征是不能根据这些影响的简单聚合来预测的。建立同胞策略理论有助于突出个性的这些突现特征,并设法描述这些特征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动力学的关系。

第三篇探讨的是社会影响,尤其是社会态度和社会阶层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影响包含家庭之间的差异。虽

然这种差异对个性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社会态度和准则的形成的确起作用;而社会态度和准则对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了解了个性与社会态度的相对独立性,有关个人生平的种种矛盾便得以解释。一个有着“顺从”个性的人也有可能具有从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那里学来的开明态度。社会态度也反映了同胞差异,不仅是子女间的,而且还有他们较近的祖辈间的差异。配偶的社会态度高度相关。同胞间世界观上的差异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选型婚配,或称“同类相配”,而不断加大。家庭所接受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是同胞差异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若要阐释激进思想,我们所需要的了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或曾经是同胞差异。

第三篇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通史上。不应用科学标准,就不易区分史学家直觉判断的正与误。史学家在此以前所采用的方法对假说的产生是极好的,但对假说的检验就不适合了。围绕本项研究,笔者将从几万部传记中选取的五十多万条传记资料细目输入了计算机。为了对如此多的信息进行综合与分析,作者利用了计算机技术与假说检验法。多数人认为科学是一门学科,如物理学或化学。其实科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对大部分历史都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

反叛的主要起因在社会生活中与在科学上是相同的吗?政治作为表达同胞策略的舞台,因暴力而变得复杂。左翼恐怖主义和平等主义是十分不同的政治倾向。历史上,这样的运动所揭示的同胞特性也相应地不同。

为了阐明家庭动力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者专门研究了新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激进的社会革命对我所提出的总的论点既可以予以检验,又能予以进一步的阐释。在这两起激进事件中,对社会变革所抱态度的最好的预测因素是

同胞间的差异。法国大革命即鲜明地再现了该隐与艾贝尔的故事。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阐释恐怖统治时期,它就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共同的家庭背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同胞中形成如此不同的政治观点。

配偶间的冲突反映了同胞冲突的规则。大多数配偶都是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并在尝试建立自己家庭位置的过程中学会了适应性的策略。社会革命使得这些同胞差异充分显现出来。并非每位参加宗教改革运动的人都有幸与一位和自己有着同样出生顺序的人结婚。结果,参加此项运动的夫妻时常就宗教和政治问题发生纠纷。亨利八世不是惟一一位其权威受到不满现状的妻子挑战的丈夫。在这些王室妻子中,有些人因信奉新教而被丈夫关押起来,另一些则被送上了断头台。出生顺序能极好地预测这些夫妻冲突,包括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位妻子所发生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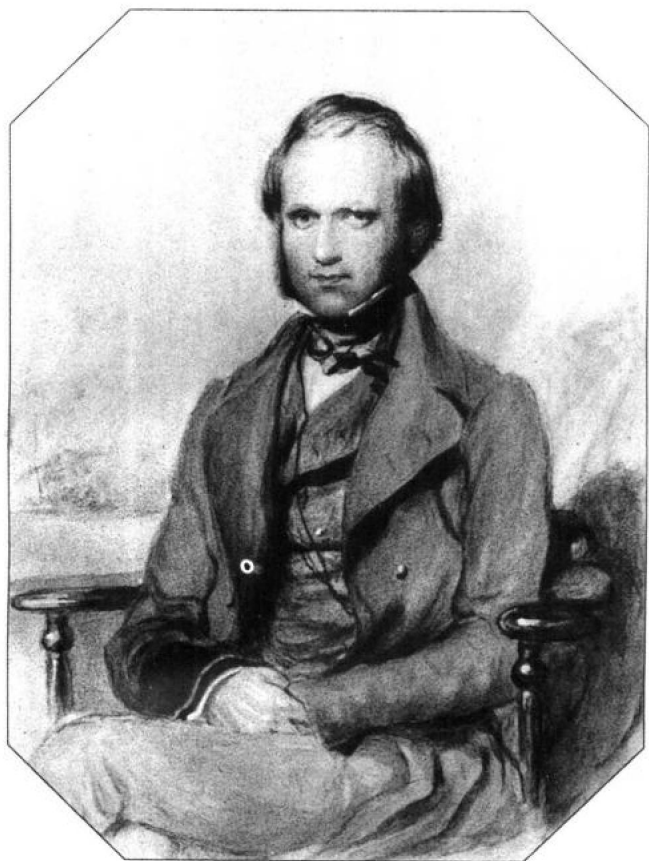
在本书的第四篇,也是最后一部分,我综合了自己有关反叛倾向的研究结果。这样做时,我要全力对付历史的高度偶然性。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展示的情况的多样性。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但只有当背景被详细说明时才如此。要想看出一些反复发生的历史格局,就要求我们对历史背景和各種生平影响进行同样分量的阐释。史学家虽然恰当地重视了历史背景的作用,但却没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的探究。由于个人多种性格倾向和各种行为背景多方面地相互作用,该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无法用叙述的方法予以解决。

如果采用单独的标准,就可以对革新作出分析与分类。革新一旦有了恰当的分类,便在其支持者的类型方面显示出显著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跨革命的。在科学上,头生子女对保守性的革新持赞成态度,而后出生子女通常反对保守性的革新。

生物学里的“生机论”屡屡为头生子女的这种偏好提供了实例。与保守性的革新形成对照的是,激进革命者的主张通常与公认的社会信条相冲突,尤其与盛行的宗教教条相冲突。哥白尼学说与达尔文主义都是由后出生者所领导,却遭到头生子女强烈反对的激进革命。

由于不同类型的革命在同一个人身上所引起的具体反应各不相同,因而历史变革的任何单一事件是不足以说明哪些人会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的。很有必要研究众多历史事件并按其限定性特征进行分类。历史事件一旦有了恰当的分类,人类行为的一致性就常常会显示出来。

在这项研究的初期,我的目标只是阐释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反叛倾向,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人们通过行为方式来解决家庭生活中的难题,这就使他们对变革将产生的正或负的效应预先就有了某种适应能力。接受还是不接受现状,这是我们每个人有时必须作出的十分重要的决定。家庭是个大熔炉,它铸造出个人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的倾向。因此家庭是历史变革最为重要的引擎之一。反叛的种种起因存在于每个家庭内部,其作用和方式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查尔斯·达尔文于1840年,这是他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贝格尔号”环球航行(1831—1836年)4年之后。

达尔文出生在一个拥有土地的绅士家庭里,他是六个孩子中的老五。他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提出了自己的进化理论,从而使生物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家庭动力学的作用,达尔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一生中注定要反叛。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科学,特别是个性形成时,是理解创造性成就的根源的惟一最好的指南。

昨夜我一直在思索究竟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成为尚未发现之物的发现者,这真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许多人很聪明——比那些发现者们要聪明得多,但却从没有任何创新之举。

——查尔斯·达尔文于
1871 年给儿子霍勒斯的信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篇 出生顺序与革命性的个性	1
第一章 接受科学革新的态度	3
第二章 出生顺序与科学革命	22
第三章 出生顺序与个性	63
第二篇 家庭的作用	93
第四章 家庭位置	95
第五章 发展中的干扰	137
第六章 性别	170
第七章 气质	198
第八章 规则的例外	225
第三篇 社会政治思想	247
第九章 社会态度	249
第十章 作为社会历史的达尔文革命	270
第十一章 新教改革运动	291